

凤 凰 周 刊 文 丛

CHINA PEOPLE

大沉浮

时代人物的命运

凤凰周刊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凤 凰 周 刊 文 丛

CHINA PEOPLE

大沉浮

时代人物的命运

凤凰周刊 编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沉浮 / 凤凰周刊编.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2.5
(凤凰周刊文丛)

ISBN 978-7-80234-691-8

I. ①大… II. ①凤… III. ①中国历史: 现代史—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1637号

书 名: 大沉浮

著作责任者: 凤凰周刊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_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691-8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1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次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84604601 84604602

网 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录

Chapter 01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003
邓小平：大地之子平民之父	009
邓朴方评说父亲“南巡讲话”	016
中共良心胡耀邦	020
我的父亲胡耀邦	026
30年不问政治的华国锋	032
薄一波行过百年路	039
任仲夷辽宁“闯禁”	045
晚年任仲夷	050
吴仪：“问题解决者”	055
吴仪的女政治家生涯	063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070
姚文元之死	079
“四人帮”的最后岁月	085

Chapter 02

宋美龄在台湾和美国的隐居生活	091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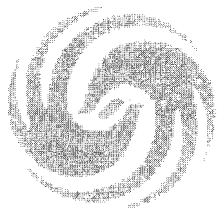
你不认识的宋美龄	099
跨过三个世纪的宋美龄	105
蒋经国：从情治头子到亲民领袖	128
我和父亲蒋经国	131
蒋经国时代的启示	136
蒋经国的赣南岁月	142
百岁老人终开口：张学良自曝风云人生	147
最后的“党国”耆宿陈立夫	155
白先勇回忆父亲白崇禧	165
于右任最后的日子	170
“御医”讲述蒋宋情感生涯	174

Chapter 03

胡适在台湾的日子	179
诤言国是的吴祖光	187
张大千的惊世情缘	192
千古绝唱：戏里戏外马连良	197
恩师马连良	229
梅兰芳的真人真事	236
一代名媛章含之	241
章乔之恋	247
猛龙过江，李敖的梦旅	251
戏剧大师尚小云往事	254
白先勇的昆曲、爱情和写作	265
刘再复：自我救赎	272
刘再复与故国、故都与故人	276
邓丽君的生前身后幕后事	282
邓丽君和中国老百姓的恋爱	287
邓丽君：政治与命运的遭遇	289

Chapter 04

我的父亲程思远	299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传奇	303
我的父亲荣毅仁	310
董时进上书毛泽东	316
董时进伯父的性情和政见	320
马林：“国共合作”之父	326
真实韩丁	331
专访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339
璩美凤忏悔录	345



Chapter 01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邓小平：大地之子平民之父
邓朴方评说父亲“南巡讲话”
中共良心胡耀邦
我的父亲胡耀邦
30年不问政治的华国锋
薄一波行过百年路
任仲夷辽宁“闯禁”
晚年任仲夷
吴仪：“问题解决者”
吴仪的女政治家生涯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姚文元之死
“四人帮”的最后岁月

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

□ 徐景贤

什么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稳定。

——这是最近中共中央党校对学员官员问卷调查的答案。

其实，任何国家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首要条件必然都是社会稳定。暴力革命、社会失序和非程序政权更替绝非民族发展正道，这也是近百年动荡历史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通启迪。

然而，如同鲁迅所说，中华民族有时也是个容易健忘的民族。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期，伴随着经济崛起而来的各种社会新矛盾新问题日趋尖锐之际，我们深感有必要重提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了唤醒人们对动荡岁月的伤痛记忆，对今昔变迁有纵向理性的比较，我们决定截取离当下最近的一段内乱史，以其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来昭示社会稳定的价值，及珍惜今天和谐发展之深远意义。

“文革”和“文革”中的典型事件——上海“一月夺权”就这样跃入我们的视线。

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文革”定性为是一场“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都为那场浩劫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林林总总的“文革”标志性事件中，我们之所以选择刊发徐景贤的《毛泽东与上海“一月夺权”》一文，是因为今年恰好是“一月夺权”40周年；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40年前活跃于权力顶端的人已开始一天天衰老甚或离世，历史纪录者有责任把他们亲历的事件保留下来，立此存照，为后人系统的研究做个标本，助他们了解“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徐景贤在“文革”时期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重要骨干，“文革”后入狱18年，1995年恢复政治权利。这样的经历决定他对“文革”中的一些事的记录可能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而同时摘登《陈丕显回忆录》更是为了对同一历史事件提供多个还原角度，让现代人看到一个民族一旦陷入群体情绪的癫狂和社会的动

荡，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将面临什么命运和结果。

大陆奉行改革开放国策已三十年，实是近百年来中国获得稳定发展的最长时段，其间民族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大国崛起举世共睹。当此之际，我们刊发这组文章，确有警醒国人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珍惜民族难得的发展良机和社会稳定局面的眷眷之心。而对文章所述史实的真伪和是非，我们作为记录者不便做出鉴定评判，仅以一家之言，供读者明辨。

我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出版以后，有的读者在读后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1967年在上海发动的‘一月夺权’，究竟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夺的，还是你们自己的发明创造？”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事实。

我在文革期间最早看到“夺权”这个词，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份文件中，毛主席亲自撰写了一段话：“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当时，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所作的指示、讲话，以及发表的文件等，都是一字一句细抠的，从中学习领会新的精神，所以，学了《通知》，我认为夺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批判”、“清洗”和“调动”。同年的8月5日，毛主席又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消息传来，我认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几个月，经过北京来上海串联的大学红卫兵的启发，又受到从上海调去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我就决心起来造反。

毛主席在生日宴会上肯定上海造反

1966年12月18日，我在上海带领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我在大会上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的名义，作了《造反更知主席亲》的专题发言，提出了“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毛主席知道后当即对我们表示支持。12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为他祝寿的饭桌上，称赞了我们提出的这几个口号，高兴地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姚文元当面问他：“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内外有别’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翌日，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这次讲话，并且告诉我最新的精神——毛主席在祝酒时宣布：“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意味着斗争要进一步升级了。

我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兴奋万状，立刻向写作班的全体成员作了传达。我还说：“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不能再犹豫了，我们要在‘全国全面内战’中立新功！”紧接着，我们抓紧筹备将在1967年1月6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中央文革调查员张春桥、姚文元来沪

就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召开前夕，1月4日的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受毛主席的委派，以中央文革调查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他们在接见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核心成员的时候，说了很多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坏话，对我们筹开的打倒市委大会表示关切，但开始时并没有提出向市委“夺权”的问题，张春桥倒是一再强调：“你们还是要抓住批判市委这个重点，让各级当权派去顶在第一线，不要把什么事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在组织撰写1月6日大会的三项通令的时候，没有提出“夺权”的口号，只是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获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上海市长；第二，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干部坚守岗位。”

当时，在我的思想认识上，认为还是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以及各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所以，我们在通令里请求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撤消有些人的职务，并没有想过由自己掌权。我当时还曾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承龙一起议论，希望中央派新的市委书记到上海任职。因为，在我们的固有观念里，省、市委这一级领导人的任免权一直在党中央，不能由下边擅自“夺权”任命的。

《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

就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刚到达上海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事：1967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布“接管”报社，并在1月5日出版了第一张“接管”后的《文汇报》，刊登了“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联合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关照过我，他们到上海来的消息要“暂时保密”，我就没有告诉《文汇报》的造反派。所以他们不知道张、姚已经飞抵上海，反而派人

连夜赶往北京，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接管”报社的事，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无功而返。

1月5日，就在上海武康路二号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工总司”负责人的会议结束以后，我收到了“接管”后出版的《文汇报》，我马上把报纸送给正在东厅休息的张、姚看，他们翻着报纸，感到十分意外。张春桥说：“我们事先不知道这件事啊！”我回答：“他们接管报社没有和我们联系。”姚文元很郑重地说：“这件事我们还需要向中央请示汇报。”说罢，他们就匆匆返回兴国路住地向中央写报告去了。

1月5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紧跟《文汇报》，宣布“接管”报社，还在报上刊登《告读者书》宣称：“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对此，张春桥和姚文元仍不表态。

然而，在北京的毛主席看到了宣布“接管”和“夺权”的上海两家报纸，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1月8日，他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又说：“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他明确地说：“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据此，《人民日报》在1月9日转载了夺权后的《文汇报》刊登的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名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主席1月8日讲话的主要内容。

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对上海“夺权”的支持。张春桥、姚文元这时也表态支持两报夺权了。当时我想：一个基层新闻、文化单位的权好夺，但对于省、市委一级的大权怎么夺呢？我心中还没有底，张、姚也没有对此作出部署。

《紧急通告》发表前后

这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自从1月6日上海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以后，从各区、县、局到各基层单位也纷纷召开批判打倒当权派的大会。有些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提出了补发工资、提高津贴、提前转正、发串联费等经济要求，而各级当权派中的某些人又根据市委“经济上放宽一些，政治上可以争取主动”的指示，纷纷签字同意发放钱款和满足某些人的经济要求。如此一来，天下大乱，银行的钱款在几天中几乎被提取一空，一些重要岗位的职工大量外出串联，港口、铁路的运输物资严重积压……

有一天晚上，王洪文带了“工总司”的几个头头来到武康路二号，说是要找张、姚紧急汇报情况。由于只有我知道张、姚在兴国路的红色保密电话的号码，我就

帮王洪文拨通了电话，王洪文焦急地汇报说：“刚才到发电厂去，上海只剩下4天剩煤了，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可是，张、姚听了汇报也毫无办法。

由于张、姚到上海后曾经面告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结束病假出来工作，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指示，陈丕显不得不站到第一线收拾残局。1月8日，陈丕显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召开会议，请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参加，共同商讨制止经济风的措施。我要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代表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参加会议。会上，大家严厉批判刮这股经济主义风是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决定联合发布一个《紧急通告》，号召全市人民起来煞住经济主义风，并由各造反组织派人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来指挥全市的生产工作。这个通告由朱永嘉起草，由各组织负责人签名，签字后由朱永嘉带回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我审定。由于通告要交市委印刷厂印20万份在全市分发、张贴，就让陈丕显在《紧急通告》上签字。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受到严厉批判的市委第一书记，在各造反组织联名批判他的文件上签字后才能付印，正好说明当时市委一级的权力还没有完全夺到造反派的手里。

我把朱永嘉起草的《紧急通告》交给两报公开发表，并把起草的经过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谁知道却挨了张春桥一顿批评，他埋怨说：“你们刚刚搞了一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怎么又发了一个《紧急通告》，这不乱了套吗？”我为此惶恐不已，还对朱永嘉说张春桥生气了，朱永嘉也惴惴不安。

毛主席下令向上海发贺电

还是毛主席和江青帮了我们的忙。1月10日，江青给毛主席送了两份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去的电讯稿：一、《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二、《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毛主席当天就把这两份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在二三日内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在《紧急通告》上署名的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这个贺电创造了几个“第一次”：第一次由中央向地方的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第一次把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并列；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大联合夺权的号召——“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上海是在1月11日的晚上，从广播里得知这份贺电的。张春桥、姚文元兴高

采烈地通知我：马上在淮海中路市委党校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他们到场，和大家共同商量如何庆祝中央贺电。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的数十万人的庆祝大会上，张、姚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公众场合亮相，通过电视发表了他们文革中来到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说。

1月16日，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中，用黑体字公布了毛主席总结的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夺权”的基本经验：“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样，我们才明确了毛主席从理论上到实践上肯定了我们向省、市委一级联合夺权。从此，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一月夺权”的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

在中央贺电发表以后，上海的某些群众组织大搞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争相夺取市委的领导权，争着为自己的组织谋取一席之地，使上海的夺权一度陷入困境。由于张春桥、姚文元做了多方面的工作，才使联合夺权取得进展。1月15日，“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司”等组织向毛主席发去电报，建议夺权后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群众自下而上的提名”，并要张、姚负责提出新的上海市委的组成名单。这样，张、姚名正言顺地出任新的上海权力机构的领导核心，陈丕显的第一书记职务实际上被毛主席的批示罢了官。经过张、姚召集各造反组织负责人共同磋商，上海终于在1967年2月5日建立了新的政权形式——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改名为军、干、群三结合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从我所亲历的事实来看，应当确认：上海“一月夺权”的指导思想是来自毛主席的，总体指挥也是由毛主席亲自担任的。在夺权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充当了组织者、领导者的重要角色，王洪文和我则是“打头阵”的骨干。而这个过程又是互动的，即毛主席以上海为试点，上海的造反组织每有新的动作，毛主席就立即抓住，作为典型，加以总结，进行指导，并且推广到全国去。这就是“一月夺权”全过程所显示的基本特点。⑤

邓小平：大地之子平民之父

——专访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榕

□ 尽 善

在邓小平逝世5周年的日子，凤凰卫视特别推出了专题片《永远的小平》。该节目以邓小平的家人、身边工作人员作为主要采访对象，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邓小平，和他风云激荡而又平和可亲的往事往情。

在农村长大的中国第二代领导人

邓小平是农民出身，本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中国大省四川。邓父邓文明是一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个妻子，他们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邓家本是客家人，在邓小平出世200年以前，祖上从华南移居四川。

牌坊村的老人——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说，邓儿时是个活泼、聪明的孩子，学东西非常快，读书只朗读三遍便能够背诵出来。邓小时候也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道德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邓小平14岁时，父亲邓文明在重庆写信告诉他，当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他问邓小平是否想进这所学校。邓小平就是因为父亲的这封信，在一年后远离了故乡，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全世界党龄最长的共产党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邓文明送儿子去法国这一举动，人们猜测颇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邓文明非常开明，不仅仅像一般农民那样望子成龙，还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当然他决不会想到，送他的长子去法国读书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

鲜为人知的两次婚姻悲剧

邓小平24岁时与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璠结婚。张锡璠1907年生于河北

省房山县良乡镇，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长相则是“少有的漂亮”。1927年，邓小平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当时曾去吃过邓张二人喜酒的郑超麟老人回忆：“张锡瑗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和李培之（王若飞的夫人）一道闹过学潮，在武汉也做过秘密工作。张锡瑗的朋友很多，当时也有其他人追求她，可她和邓小平结了婚。”

两年后张锡瑗死于难产。关于她去世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邓小平对自己的私生活一直保持沉默，他从不对外人谈他的感情，在他的官方传记里甚至没有提及这次婚姻。

据中央特科人员李强回忆，邓小平曾委托他代为埋葬妻子。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一进城就去找张锡瑗的坟墓。因为战乱，日本人又在公墓那里动土修机场，公墓已面目全非。邓小平把她的遗骨重新放置在一个小棺木中，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她的墓碑上镶嵌着她唯一一张保存下来的照片。

1932年夏天，邓小平第二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金维映也是共产党员，是30名参加长征的妇女中的一位，但长征也损坏了她的健康。1933年，邓小平贬任江西会昌县委书记，金维映在遭到打击、身处厄运的时候离邓而去，倒向当时负责审查邓小平的组织部长李维汉的怀抱。长征到达延安后，金维映的精神病况愈来愈严重，后被送往莫斯科治疗，1941年莫斯科被德军飞机轰炸时下落不明。

1939年7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新婚妻子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是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其父亲从一个贫寒的马帮青年奋斗成为全国闻名的巨商。卓琳是20世纪30年代云南女孩里第一个考入北京读书的，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和邓小平都属龙，比邓小12岁。从当年的照片上看，卓琳有着一张瓜子脸，身材苗条，相当美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俩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几次追求卓琳被拒绝

卓琳从陕北公学毕业后分配在公安部工作。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回延安开会时两人相遇相识。60多年后，从来没把邓小平当成伟人的卓琳回忆说，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邓小平经常到公安部来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思了，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拒绝了。”

实际上，卓琳身为富商之女，心底里很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因为“他们没有知识，跟他说话说不到一块儿。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

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她的丈夫就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不能找长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邓小平在婚姻上也表现出了他的顽强，卓琳婉拒之后，他这个师政委居然放下架子亲自出马去找卓琳，两人以八路军速战速决的方式谈了两次之后，邓小平就成功地获得了爱情。卓琳说：“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第一，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 23 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同意了结婚。”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被卓琳称为“老干部”的 35 岁的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婚礼。

邓小平不苟言笑，毛泽东评价他是少年老成，绵里藏针，许多人见他都有点怯。但是卓琳因为是“少妻”，邓小平也得让她三分。卓琳说：“我跟他谈，我说话你得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结婚以后，他就带着我回前方去了，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开会才能见个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从此，卓琳就一直跟随着丈夫，并相继生下了五个孩子。三个大的——邓林、邓朴方、邓楠因为生在战争年代，都曾寄养在老乡家里。进军西南时，邓小平下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卓琳不干了，她说：“你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我们。”

西南多土匪，为了安全，一般是有侦察兵看好路了，军政首长在前边，卓琳带着孩子在后头。一次，他们遇到了土匪袭击，但那一天恰好邓小平卫队的车坏了，落在了后头，土匪按照惯例思维，与卫队的车打了起来，使卓琳一家躲过一劫。

中共领导人中最幸福的婚姻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曾三次被“打倒”。第一次是 1933 年的红军时期，第二次是 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第二号走资派”。第三次是 1976 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三次厄运中，后两次最为惨烈、最为让人绝望。但由于有卓琳温情与坚贞的支撑，终于使邓小平顽强地摆脱了厄运，步入了世界级伟